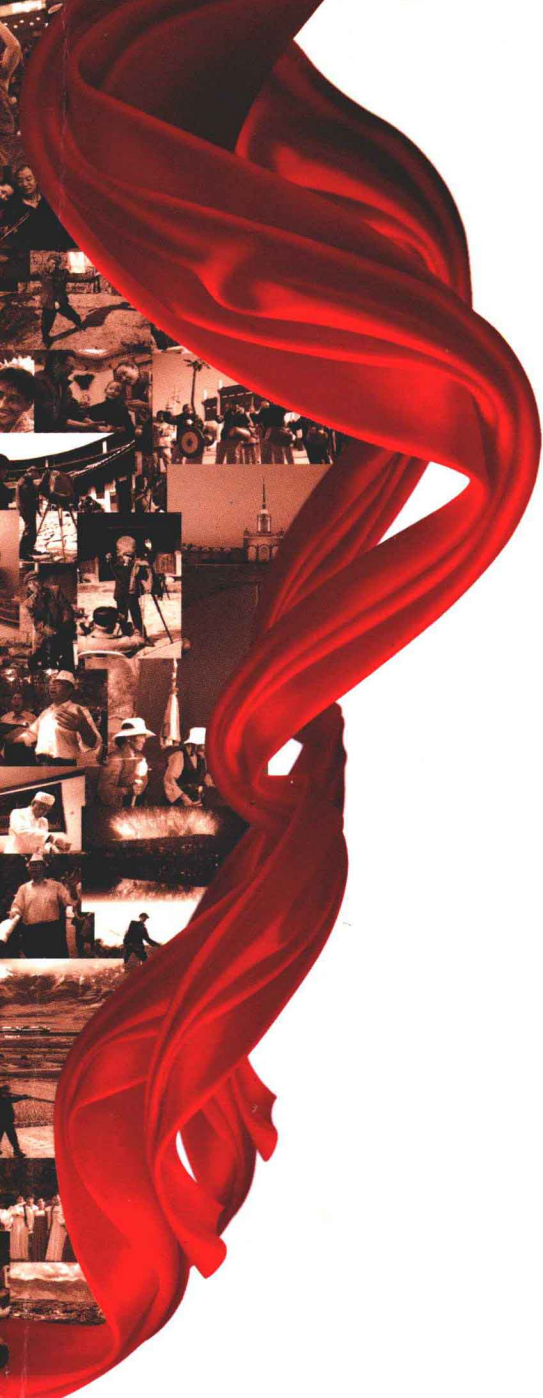


国 情 故 事

● 孙 冉 著

我们的 60 年



辽海传播出版社

我们的六十年

◎ 孙 冉 著

辽海传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的六十年 / 孙冉著.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9.7 (国情故事)

ISBN 978-7-5085-1581-6

I. 我 ... II. 孙 ... III. 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中国 IV. D6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4543 号

我们的六十年

著 者 / 孙 冉

图片提供 / 刘 震 黄 宇 China Foto Press FOTOE 等

责任编辑 / 覃田甜

装帧设计 / 田 林 傅晓斌

制 作 / 北京原色印象文化艺术中心

出版发行 / 五洲传播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莲花池东路北小马厂 6 号华天大厦 25 层)

承 印 者 / 北京画中国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 4

字 数 / 60 千

印 数 / 1-2000 册

定 价 / 28.00 元



目录

前言 I

一 小岗村：六十年的分与合 3

二 中国的俄语一代 25

三 火红的全民体育时代 47

四 穆斯林的筵席 67

五 索朗白姆的路 85

六 乡村摄影师的 63 年 107

前言

我试图书写六十年来一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其中有小岗村的农民、西藏最后的贵族、学习俄语的一代中国人、全民体育时代下的运动员、身处新旧交替的民族手工业者，等等。

他们都是小人物，也是这个社会真实的一分子。身处大历史之中，时代造就了他们共同的命运，我发现我所记录的，从来都不止是某一个人的故事，而往往是他们一代人的共同命运。

因此我越是走近他们，就越发感到困惑，和他们排在一起称为“我们”究竟合适不合适。但事实上，我所知道的这个“我们”，远比他们心里的“我们”要单纯得多，我眼里的“我们”只是一个简单的、自由的共同体。而对于他们，“我们”这个词，却是国家、民族以及不可逃避的宿命，它注定意味着更多更深重的内涵。

这是“我们”和“他们”的区别，这是时代给我们和他们的最佳分野。我们没有“他们”关于共和国最初的欢欣喜悦；没有“他们”建国之初获得新身

份那一刻的重生；没有“他们”所处的疯狂的年代；没有他们集体回归理智后的物质苍白；没有他们在市场经济大潮下感受到的冲击；更没有他们如今面对过去，所表现的那份平静和淡然。

时间就是一条河，我们从来都不可能踏入两次。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身边的这个城市正在为即将到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国庆作着种种准备。当每个人谈到这个国家的时候都自豪非凡。但很少有人静下心来想想国家之于我们究竟是什么。

在我采访这些人的过程中，我几乎问了他们一个同样的问题：国家是什么？

没有一个人给我一个确切的答案，如果有一致，那就是，国家即是我们，是我们共同的经历。当我听他们讲述每一个十周年的大庆带给他们的喜悦的时候，我就从心里明白我的喜悦和他们的喜悦竟然如此天差地别。

共和国的六十年，这些人共同走过了人生的黄金年代，他们的成长和悲欢，或许只是13亿中国人中的个例，但从他们身上我们依然可以测量出这六十年的温度，也依然可以看到改变中国社会面貌的力量。

孙冉

2009年6月于北京



一 小岗村： 六十年的分与合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一个原本普普通通的小村庄，在 1978 年因率先打破“大锅饭”、实行“包产到户”而揭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小岗村土地的分分合合，是中国千万个乡村的缩影。人们对小岗村既充满了眷恋又寄予厚望，今日的小岗酝酿着又一场新的变革。

小岗村“首富”严宏昌家里的摆设依旧停留在 1998 年，当年的 25 寸彩电，当年的照片，当年的一桌数椅。这个 1978 年“大包干”的带头人说：“我时常站在历史的角落审视未来。”而从堂屋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看到三张醒目的大照片——



按满了鲜红手印的契约书，是当年“大包干”的重要历史见证。（CFP 提供）

照片一：1978 年，落着鲜红手印的契约书；照片二：1997 年，一张“改革不忘邓小平”的《人民日报》头版被裱入镜框；照片三：1998 年，江泽民来到小岗村。这年的 9 月 22 日，江泽民来到了小

岗村，就在严宏昌的院子里与村民座谈，并说了一句影响中国农村改革走向的话：土地承包“30年不变”，小岗人“要再闯一闯”。

怎么闯？当着总书记的面，严宏昌表态，“大包干”大有可为，先富起来一批，先富带动后富，带着村民闯一闯。而另一位“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当时却反映，“大包干”已经走不通了，要想富，必须把地合起来。而围绕着这片贫瘠土地的分分合合，这些人已经讨论整整六十年了。

三十年河东

安徽凤阳位于淮河中游南岸，气候温和、四季分明。1949年以前，凤阳除几户特别困难的农户时有外出乞讨外，其余均能自食其力。按照当地人的话说，“生活苦，吃粗粮，但是能吃饱。”1932年，小岗遭遇特大干旱，全村有一半人外出乞讨，这是小岗人在建国前最痛苦的记忆。

1949年1月26日，在淮海战役胜利的号角声中，一支400多人的解放军队伍进入凤阳城，凤阳宣布解放。解放后，新政权在这里开展了清匪反霸、划分阶级成分和土地改革等运动。



土改时期，小岗与大严、小严三个自然村合称“大严村”。全村约有100户，按照当时村长徐文开的回忆，大严村划分阶级成分有两次，第一次是1950年的冬天，当时大严村没有一户农民被划为地主；第二次是1951年，新的工作组认为一个村没有一户地主，不符合上级要求，于是开始“纠偏”，将小严村的严凤祥划成了地主。当时严家有11口人、几十亩耕地，把土地租给人耕种，还开了个槽坊，雇了两个伙计，生活还过得去，不用外出要饭。

在新工作组的“纠偏”下，小岗村出现了几户成分较高的农户，但对整个村子来说，“两极分化”十分模糊，阶级对立并不严重，当地农民普遍贫穷。对于小岗来说，即使“纠偏”了，还是连一户地主和富农都没有。在划分阶级成分的过程中，其中一项就是斗地主。刚开始小岗无地主，小岗人就跑到其他村子去斗地主。后来严凤祥被划为小严村的地主并被斗过好几次，小岗人全都参加了。

随后就开始了土地改革。小岗人差不多都分到了土地，对未来生活迸发出从未有过的极大热情。建国前夕，由于小岗一带的荒地很多，于是在极大热情下，小岗人开始大张旗鼓地开荒，仅仅几年



的时间，小岗的耕地就从原来的 500 多亩发展到了 1000 余亩。

建国之初，农村确定了一条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道路，共分三步走：第一步，自愿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二步，在互助组的基础上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生产合作社；第三步，自愿组成高级农业合作社。

凤阳县的互助组是从 1950 年开始逐渐建立起来的。当年全县仅有几百个互助组，1952 年后，互助合作的运动开始加快，小岗互助组第一次诞生了。到了 1955 年底，小岗已有 34 户，除了一个三四户的互助组外，其余约 30 户仍然坚持单干。

就在建国后短短七年的单干时期，小岗村的经济得以较快发展，人口也增加了。严俊昌的父亲家里，当时有六口人，生活不仅可以自给自足，还有节余。“盖新房、娶新娘、穿新衣、吃陈粮”，成了小岗人建国之初新生活的标志。

三十年河西

到了 1955 年，农业合作化运动掀起了一个新潮，小岗村开始从互助组向高级社发展。

1956年春天，从县上来了干部，动员小岗人加入高级社。严俊昌的父亲严家其记得，在动员大会上，一位姓黄的干部说，共产主义是天堂，农业合作社是桥梁，只要走上这座桥，就可以上天堂。而天堂将分三步走：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当时这个干部说，“你们小岗人大多没办互助组，没办初级社，现在你们要从单干一步上天堂。”

面对动员干部的动情之语，小岗人的心情是复杂的。对加入高级社之后的天堂之路，他们是期盼的，但高级社要无偿收回他们的土地，却让这些农民犯了嘀咕，土地证才拿到手不到四年，还没有“捂热”又要上交了。因此任凭干部们千言万语，小岗人始终犹豫不决。

面对这个局面，下派的工作组放弃了“自愿”的原则，开始采取一些强迫的手段。他们宣布，凡是不愿入社的，团员要开除，贫下中农要“提高成分”，贷过款的要立即归还。接下来采用各个击破的办法，重点突击不愿入社的农民。

到了这一年秋天，小岗全部34户都加入了高级社。入社前夜，生产资料要汇总上交给集体，小岗农民都开始偷偷把自己的牛杀了，他们不愿意自



己的私有财产无偿收归集体，纷纷选择“光着身子”入社。这年冬天又下了一场大雪，天气特别寒冷，又冻死了很多牲口。当时，大批的耕牛死亡，成为小岗人最深刻的记忆。

这一年年底核算，小岗人第一次变穷了，他们普遍比上一年每天收入少了2毛钱。收入的减少让向往“天堂”的小岗人开始动摇了。这一年小岗向国家交了4万多斤粮食，这是合作化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此后23年来的最后一次。

由于经济收入的减少，到了1957年，凤阳县很多合作社相继发生了“闹社”事件。消息传至小岗，很多社员对合作化的不满开始发酵，村民们酝酿着集体退社。此时，城里的“反右”之风也刮到了小岗，小岗人在讨论合作社是否优越的时候，谁要说个“不”字，就立马被扣上一顶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当时小岗的生产队长严立忠发牢骚说，“现在小岗全队收的粮食还不如我家从前一年收的多”，因此就被捆起来批斗。对合作社的不满虽被强压了下去，但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却是一落千丈。加上1957年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秋季水稻几乎颗粒未收。严家其回忆，这一年每人只分到了5斤半小麦。小



岗第一次开始靠国家救济了。

1958年，一个全新的名词摆在了小岗人面前——人民公社。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关于《办人民公社好》的讲话，此后一个月，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就实现了人民公社。所谓“人民公社”，是在高级农业生产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

根据当年档案，凤阳县实现人民公社仅仅用了48天，全县100%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这一年，中国人普遍沉浸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喜庆中，每个人都感觉就要跨入共产主义了。当时的社会正处于“一天等于20年”的加速度中。

这一年秋天，小岗人加入了“卫星人民公社”，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吃饭不要钱，集体上食堂。所有村民的牲口都被集中到公社里，办起了“万头猪场”和“万鸡山”。当时年仅10岁的严宏昌就在“万头猪场”喂猪。说是“万头猪场”，事实上算上小猪仔，也就五六十头猪，半年之后，猪场的猪或死或被拉走，猪场倒闭。这年8月，大炼钢铁开始了，小岗人把家里凡是能找到的铁钉、铁丝都上缴组织大炼



钢铁了。

到了1960年，小岗到了最艰难的时期。自从吃大锅饭，开始还是“两干一稀”，后来粮食越来越少，一日两餐都是稀汤。人们开始想方设法找吃的——榨油后的豆饼、磨面剩下的麸子等等一切能替代食物的，到了后来，可以勉强填饱肚子的树皮和树叶也成了小岗人的盘中餐。

1961年面对农村日益困难的局面，党中央开始对农村政策进行一系列的调整。1961年3月，凤阳县开始试行责任田，其核心就是包产到户。责任田被小岗人称为“救命田”，乡村逐渐出现了些许生机。然而，好日子持续了没有几天，责任田推行了半年，就被称为“资本主义复辟”。

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指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七千多人。）上，安徽省委书记曹希圣遭遇了撤职处分，罪名就是在安徽搞责任田，“犯了方向性错误”。消息传到小岗，当时正值春播，三年自然灾害已经让这里丧失了70%的生产能力。开始小



岗人都不相信，他们怀疑“不会把我们再关起来吧”。几天后，工作组到了小岗，列举了“责任田”的六大罪状，让小岗人再也看不到包产到户的希望。

到了1963年责任田被彻底纠正。这年秋天，在快要收割的时候，生产队要收回责任田的粮食了，农民们还未等粮食成熟，就开始抢割小麦。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小岗人对于这场政治风波仿佛并不感兴趣，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当权派也就是生产队长，最大的造反派就是生产副队长。“文革”就仅仅是这两个公社干部之间的斗争。

不久，因为搞自由市场，小岗大队长严金昌被撤职，顶替他的是单身汉关德友，他家一贫如洗，年年靠外出乞讨为生。工作组表扬他是全村无产阶级的典型。谁知道关德友不勤快、不种地，全靠外出讨饭过日子，留在队里当队长，连自己吃的都无法解决。后来工作组决定，破例给这个无产阶级典型每天三斤大米吃，支持他的工作。正是为了这每天三斤大米的待遇，每到秋后，围绕队长的职位小岗村人就难免一番争斗，人心散了，土地荒了，集体斗穷了。



在一系列运动的折腾下，小岗人的生产积极性一落千丈，生活每况愈下，全年 10 个月吃供应粮。于是，出路只有一条——要饭。当时，小岗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小岗家家穷光蛋，碾子一住就要饭。”

在小岗人的记忆里，他们只出过两个公家人，一个是老师严荣昌，只有他家没有要过饭；另一个是镇信用社的严立厚，他老婆也照样得出去要饭。而其余的人家，每年有大半年时间难以解决吃饭问题，只有去乞讨。在小岗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家可以派出一人到外面“搞生活”，就是要饭，人多的可以去两人。小岗人讨饭走得也不远，往南到江浙，往北到徐州。而外出讨饭，总比在生产队的收入高。

1969 年严宏昌跟着兄弟严俊昌结伴出去讨饭，这是他第一次干这个。这种要饭的日子一直过了九年，给严家兄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20 世纪 80 年代，严宏昌一家人
在自家茅草屋前合影。（汪强 摄）